



ZHONGGUO JINDAI SIXIANG SHILUN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雷广臻◎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ZHONGGUO JINDAI SIXIANG SHILUN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雷广臻◎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 雷广臻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303-15074-8

I. ①中… II. ①雷…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56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3.5
字数: 248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吴 晶 刘东明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篇 洋务派的衰世挽歌

- 第一章 “师长论”及其发展 (3)
- 第一节 “师长论” (3)
- 第二节 “中体西用”是“师夷长技”的进步 (5)
- 第二章 论恶的作用及洋务运动 (7)
- 第一节 恩格斯论恶 (7)
- 第二节 恶与洋务运动 (10)
- 第三章 洋务派的伦理思想 (14)
- 第一节 扶持名教，敦叙人伦 (15)
- 第二节 会通“心”、“智”，维护“圣道”、“纲常” (16)
- 第三节 洋务派的“道器”、“性命”、“仁义”观点 (18)
- 第四章 洋务派的事功和修身思想 (23)
- 第一节 “敬恕二字”，“立身要旨” (23)
- 第二节 “名节廉耻”等规范和要求 (24)
- 第三节 曾国藩的事功、修养思想 (25)
- 第四节 修身养性方法 (27)
- 第五节 洋务派代表人物伦理思想的共性与特性 (29)

第五章 张之洞《劝学篇》的理论构架与思想倾向	(31)
第一节 心、智是《劝学篇》理论构架的支柱	(31)
第二节 “同心”的途径和目标	(32)
第三节 “益智”的方法和目的	(34)
第四节 《劝学篇》的骨架	(37)
第五节 从新角度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40)
第六节 旧者攻其新，新者攻其旧	(42)
第二篇 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	
第六章 洪秀全的思想体系	(47)
第一节 洪秀全的民主、宗教与皇权思想	(47)
第二节 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的宗教体系与社会根源	(50)
第七章 洪仁玕的“民主”设想	(55)
第一节 新主张	(55)
第二节 发展社会事业	(56)
第三篇 维新派的大海潮音	
第八章 维新派的哲学思想	(59)
第一节 世界起源和世界本体观念	(60)
第二节 “变易”运动观	(63)
第三节 社会历史观	(67)
第四节 维新派的认识论	(77)
第九章 维新派的伦理思想	(87)
第一节 维新派对人性的认识	(87)
第二节 维新派对封建道德的继承和批判	(91)
第三节 中西伦理比较的视角	(99)
第四节 道德实践与道德理想	(106)
第十章 戊戌社会思潮中的功利主义色彩	(115)
第一节 严复、梁启超的桥梁作用	(115)
第二节 “积垛”法与“合成说”	(116)
第三节 西方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翻版	(119)
第四节 本土的功利主义思想	(121)
第五节 东方的带有佛教色彩的功利主义	(123)

第四篇 维新与革命派之间的梁启超思想

第十一章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总纲	(129)
第一节 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129)
第二节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总结构	(133)
第三节 梁启超伦理思想特色	(141)
第十二章 梁启超的民权和“中国魂”思想	(145)
第一节 梁启超的民权观	(145)
第二节 “中国魂”与“少年中国”	(147)

第五篇 旧民主主义思潮

第十三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对民主的探索	(157)
第一节 早期改良者的政治向往	(157)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思想	(162)
第三节 新旧民主革命更替时期与科学并称的民主	(172)
第四节 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初步运用	(180)

第六篇 中国近代社会及研究方法

第十四章 中国近代社会	(185)
第一节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	(185)
第二节 没有变成现实的历史可能性	(188)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民主化历程	(189)
第四节 中国近代社会走向开放历程	(193)
第十五章 中国近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因	(197)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97)
第二节 研究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199)
第三节 什么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02)
第十六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比较方法	(204)
第一节 顺向研究方法和顺向比较方法	(205)
第二节 逆向研究方法和逆向比较方法	(205)
第三节 横向研究和横向比较方法	(206)
第四节 展望方法	(207)
后记	(209)

第一篇 洋务派的衰世挽歌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魏源提出了“师长论”，开了打破故步自封思想的先河，随之而来的“中体西用”思想，成为“学体”思想的桥梁。洋务运动是以“师长论”和“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的。洋务派是有思想有纲领的，其伦理思想尤其丰富多彩，关于事功和修身思想也比较突出。

第一章

“师长论”及其发展

鸦片战争前十多年，中国地主阶级思想家已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肖枚生就意识到：“……十年之前，……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①包世臣说：“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②

那时的思想家认为西洋人“桀骜狡黠，常有轻易中国之心”。第一，向中国输送鸦片“用心叵测，流毒无穷”。第二，提出了“威治”措施。1835年，黄爵滋上书说：“臣窃谓夷人性情，本难恩感，当以威治。我示之弱则彼强，我示之强则彼弱；……威治之道貌岸然，不在临时之张皇，要在平日之振作。”第三，还有人提出“恩威并重”的办法。就如何“制夷”问题，张际亮提出“因势补救”思想：“今日之势，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源，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第四，面临从来没有的危机，应有新的补救办法。“因势补救”思想高于同时代人，但没有魏源后来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深刻、具体。“师长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先河。

第一节 “师长论”

鸦片战争爆发，大炮比鸦片起到了使人更清醒的作用。要“制夷”，是进步

^① 包世臣：《答肖枚生书》，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见《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5页。

思想家共有的呼声。怎么样制夷？林则徐提出“制夷不闭关”，“分出良莠”：抗违者和恭顺者，只要遵守中国法度就是“恭顺者”，允许其通商（恭顺者）；不遵守法度的“英夷”，则不准通商（抗违者），这样，“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念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制夷不闭关”，可以收到分化夷人的效果，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包世臣作《歼夷议》、陈金诚作《平夷论》、苏州唐某作《剿逆说》，无非要“威治”或“恩威并重”。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州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作《海国图志》六十卷，提出了超过同代思想家的“师长论”。

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第一，“师长论”是对张际亮的“因势补救”思想和林则徐的“制夷不闭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师夷长技”是“因势补救”的办法和措施。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船坚炮利”也是现实。闭着眼睛不承认既成事实是一种人的做法；承认时势变了，因势补救，是另一种人的做法。张际亮看到了变化的事实，要因势设法挽救危局，这就表明他比前一种人开明些、实际些。魏源在“因势”这个前提上与张际亮是一致的，提出“师夷长技”，是“补救”思想的具体化，“制夷”与“补救”，目的是一样的。魏源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形势、更具体地提出了补救办法，这就使他站在了比张际亮更高的位置上。林则徐把“制夷”与通商协调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认识到闭关不能制夷，不闭关反而能“以夷制夷”，这比很多官僚识时务、知实情。魏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当然以不闭关为前提。要制夷必须与夷打交道，这一点林、魏二人是一致的。林则徐认为不闭关，才能与西人打交道，“以夷制夷”；魏源则前进了一步，不仅不闭关，而且要学习西人的先进技术，才能制夷。魏源比林则徐的思想深入了。

第二，“师长论”开了打破故步自封思想的先河。“夷”字，古用来称我国东方的民族，后来泛称少数民族、外国或外国人。“夷”字含有轻蔑的意思。魏源居然大胆提出“师夷”，把“师”字与“夷”字联系起来，真是石破天惊。“师夷”不仅要有承认现实的勇气，而且还要改变妄自尊大的传统心理。由老师变为学生，表面上有面子问题，实际上有是否敢于正视世界的勇气问题。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折。

第三，“师长论”并不是主张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有所选择。魏源主要着眼于军事问题来谈“师夷”的。御敌，要知己知彼。“师夷”是为了知

彼，同时为了壮己。“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知夷形、夷情，才能“制夷”；“攻之（夷）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①这谈的是军事。赔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为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夷之长技”仅限于军事上，即还没有承认军事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长技。所以学习西方的技术，主要是军事技术，而不是一切先进的东西。魏源开学习西方思想的先河，但又受到了时代的局限。这种局限在魏源以后不断被不同等级的思想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所突破，中西方文化观不断被丰富和发展。

第二节 “中体西用”是“师夷长技”的进步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改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了解西方。“知其形”、“知其情”。二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三是催人“发愤”，“平人心之积患”。开人心智，奋发图强，打破理学、腐儒的束缚。四是御敌。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开人心智的目的是“御敌”。

魏源的变易社会观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基础。魏源认为，中国社会墨守成规不行了；以不变来御敌是行不通的，要来一个大变动；变动的主要手段和措施是“师夷长技”。魏源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思想，“前驱先路”。

但是，“师夷”会冲击封建体制，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怎样？如何摆布？魏源没有面对这一课题，所以也就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伴随“师夷”的进程必定要出现的。洋务派开展了“师夷长技”的运动，冲出了封建的中学。中学和西学的矛盾出现了，有时很尖锐。既不能离开封建的根基，也不能没有西学的地位，时人概括出“中体西用”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一是社会进步了。魏源疾呼“师夷”，洋务派执行了魏源的遗嘱。中国毕竟有了机器工厂、自制的热兵器和民用商品，等等。正因为这样，西学和中学的冲突更直接、更现实了，也才有了滋长“中体西用”思想的土壤。二是“中体西用”的提出，在当时对封建思想来说是异端。封建制度国体，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容侵犯的。提出“中体西用”，说明中体面临着挑战。“中体”面临着危机，

^① 魏源：《海国图志》，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需要西学来解救。维护封建制度(中体)的思想在封建史书里汗牛充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意在于“西用”。把西学和中学放在一个范畴里,概括出二者关系,这样就肯定了西学的地位。三是“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和“学体”思想的桥梁。戊戌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同时以学习政治制度为根本任务。维新派批判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而继承了“西学为用”思想。学“用”是“师夷”的进步,学“体”是学“用”的进步,“中体西用”是“师夷”和“学体”思想的桥梁。四是“制夷”和“师夷”不能分开来评价。

对洋务派的批评主要不在“师夷”上,而在于是否“制夷”上。“师夷”和“制夷”在魏源那里是连在一起的,而在洋务派那里似乎分开了,“中体西用”中不包含“制夷”思想因素。洋务派的“师夷”总的来说应该肯定,对于是否“制夷”以及程度如何,是对“中体西用”思想评价的关键。不强调“制夷”和触动封建制度,这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章

论恶的作用及洋务运动

研究历史经常碰到“恶”这个问题。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反动运动。因为它是中外反动派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维护和巩固封建反动统治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是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又是曾国藩、李鸿章们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总之，洋务运动是恶，洋务派曾、李之流作恶多端。

奴隶社会以来，社会充满了恶的历史现象。有的恶现象是历史逆流的附产物，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希特勒发动战争；有的恶现象伴随着历史进步而来，如血腥的奴隶剥削方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羊吃人”一类）。革命导师对后一种恶现象的论述可以给我们研究洋务运动以补益。

第一节 恩格斯论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述了文明时代的恶现象。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了氏族制度：“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不会有贫困的人，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

敢，……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① 这样的社会确实是“美妙的”。

赞扬之后，恩格斯说：“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为什么注定(必然性)要灭亡？“生产极不发展”、“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② 所以，不管怎么值得赞叹，一定要灭亡。取代原始“美妙的”民族制度的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③。

恩格斯严厉抨击了“堕落的势力”(剥削社会)：“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④ 这样的社会，只是少数人靠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

抨击并没有影响全面的分析，恩格斯在作本书的总结时说：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⑤，“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⑥。

原始社会被奴隶社会取代，这是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必然更替。接下去，恩格斯精彩地论述了恶与历史进步的关系：

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民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变本加厉地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积累财富方面的成就。在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进步和退步、解放和压迫相伴随。^⑦ 对恶，应当批判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为恶而否定历史的进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同上书，96页。

③ 同上书，9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174页。

⑥ 同上书，177页。

⑦ 同上书，177~178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之罪恶：“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①。“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②。巴特里附近8个大工厂中，有几位厂主雇用5名12~15岁的儿童，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允许有任何休息……

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小屋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鼻来保护自己的肺，工人，不论是童工还是女工，“‘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资产阶级还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⑤

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资产阶级的成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⑥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关系，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们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从某一角度看，关系简单化了）；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⑦；它不断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目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增加，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愚昧状态……这一系列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式为资产阶级赞功，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太过了，还可能有人会吓破胆。其实，这是真实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同上书，197页。

③ 同上书，200页。

④ 同上书，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5页。

⑥ 同上书，274页。

⑦ 同上书，274~275页。

情况：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魔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革命导师敢于在《共产党宣言》里毫不隐瞒、毫不胆怯地论述罪恶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说明无产阶级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科学地评价历史现象的。

晚年的恩格斯在论述恶的时候又前进了一步。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②

恩格斯在评述这段话时，使用的“恶”概念不仅指人本性，而且有了更广泛的外延：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接着，恩格斯批评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③

恶有两重意思，一是对神圣事物的亵渎、叛逆，二是恶劣的情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恶在历史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 恶与洋务运动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谈洋务运动。毋庸讳言，洋务运动是中外势力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以及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7页。

② 同上书，237页。

③ 同上。

“罪恶”产物。办洋务的热潮是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阶级，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的背景下兴起的。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恶”人在“恶”的环境下“办洋务”，遂有洋务运动。“当时所谓洋务揭开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及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①包括对外交涉、签订条约、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内容。在外交和雇用外国军官等方面，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是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应该指出，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所有的“恶”，我们过去的揭露和批判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曾、李等洋务派在中国近代犯下了滔天罪行，不揭露和批判不足以鉴今人、警来世，批判“恶”是在做光明正大的事情，但我们要像革命导师做的那样，对某一历史现象不因其“恶”而否定其进步作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浩浩荡荡冲击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②洋务运动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拍击中国大陆而激起的小小的浪花，至于这个浪花是晶莹的还是污浊的都无关紧要。

这个浪花的核心是“引进工业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搞引进。英国开世界工业革命之端，随后法国、美国、德国、俄国都开始了具有本国特征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中心内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19世纪60年代以前，除了外资办的少数航运、面粉等企业外，中国的手工业工场和手工作坊以及农业生产都是手工操作，这就使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工业革命成为必要并提上日程。

从1861年到1894年，洋务派在安庆、上海、苏州、南京、福州、天津、西安、兰州、广州、济南、长沙、成都、吉林、杭州、北京、昆明、太原、台北、汉阳等地建立了24个近代军用工业企业^③，大部分企业采用机器生产，所造枪炮、弹药用于军队。中国的武器开始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

洋务派在1872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为中国近代航运业之开端。1875—1895年，各地先后出现了规模不同的新式煤矿16座，很多煤矿用机器采煤；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